

16人访谈录

理性的激情

国际经济学殿堂的
中国建筑师

肖瑞 李利明 编著



中信出版社
CITIC PUBLISHING HOUSE

国际经济学殿堂 的中国建筑师

理性的激情

国际经济学殿堂的
中国建筑师

肖瑞 李利明 编著

中信出版社
CITIC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理性的激情——国际经济学殿堂的中国建筑师 / 肖瑞、李利明编著.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03.12

ISBN 7-5086-0056-8/F · 663

I. 理… II. ①肖… ②李… III. 经济学家-访问记-中国 IV. K825.3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3) 第108373号

理性的激情——国际经济学殿堂的中国建筑师

LIXING DE JIQING——GUOJI JINGJIXUE DIANTANG DE ZHONGGUO JIANZHUSHI

编 著 者: 肖 瑞 李利明

责任编辑:《比较》编辑室 + 王颖

出 版 者: 中信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东外大街亮马河南路14号塔园外交办公大楼 邮编 100600)

经 销 者: 中信联合发行有限公司

承 印 者: 北京牛山世兴印刷厂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28.25 字 数: 450千字

版 次: 2004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04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086-0056-8/F · 663

定 价: 35.00元

版权所有 · 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 由发行公司负责退换。服务热线: 010-85322521

E-mail: sales@citicpub.com

010-85322522

序

最近留学海外的学者越来越多地回到祖国，有的定居，有的两头奔波。过去大家担心出国留学是一种人才流失，现在随着祖国建设的蒸蒸日上，回国直接为祖国服务的人日益增多。就是继续留在国外的也以各种方法在间接地回报祖国。别的学科我不知道，就经济学而言，回国的经济学家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他们不但在学校里传授经济学，而且参加到国内各种经济政策的讨论中来，在经济政策的决策过程中，直接或间接地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为了更好地发挥他们的作用，对他们的学术思想有更多的了解，并进而对他们的人生经历有所知晓，都是十分必要的。这本书就起到了这样的作用。它一方面帮助我们比较完整地知道他们每个人的学术贡献和研究专长，另一方面他们个人的故事也非常动人，读来生动有趣，其中还包含着不少世道哲理。

书中介绍的这十六位学者中，有一半以上都是我原来就认识的，有的还有比较深的个人交往。现在他们的年龄大约在50岁左右，是在解放前后出生的。他们经过了反右，三年灾荒和文化大革命。虽然那时年龄还小，不大懂事，但是一些切肤之痛是能够感受的。尤其是文化大革命，正当应该上大学念书的时候，忽然碰到晴天霹雳，个人和家庭都经历巨变，印象是非常深刻的。他们的故事归纳起来可以说，解放后到1978年的三十年，尤其是文革的八年，是一个使全社会痛苦极大化的制度。用经济学的话来说，是一个逆帕累托改进的过程。每一次运动都使一大批人受苦遭难，而没有人得益。为什么这样一个荒谬的制度竟然能够维持三十年，这是制度经济学应该深入研究的重大课题。

现在文革已经结束，痛苦极大化的过程也跟着结束，代之以赚钱极大化。当然比过去强多了，从经济学家的眼光来看，这是很合理的。但是仔细想来，我们所追求的并不是财富的极大化，而应是快乐的极大化。财富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还有许多不用钱也能够得到快乐的方法，更何况还有人当了钱的奴隶。因为钱，身心都遭到巨大伤害而不自觉。快乐极大化是一个真正

的帕累托改进过程，是在没有人痛苦的情况下至少有一个人更快乐。宽以待人，与人为善，成人之美，相互合作，彼此尊重，接济穷人，就能够做到全社会的快乐极大化。我国社会要做到这样的文明程度，从赚钱极大化转变为快乐极大化，从一切为了钱变为赚钱和花钱都能给自己和他人带来快乐，还有相当的距离。

邓小平的拨乱反正改变了全部中国人的命运，当时三十岁上下的人开始离开被迫下放的农村或工厂各奔前程，其中的佼佼者有机会出了国。在国外学习同样是一个艰苦过程。开始时，言语不太通，经济很拮据，新的学问是完全陌生的东西，再加生活在一个无依无靠，举目无亲的环境中，经受的压力可想而知。他们依靠在文革中锻炼出来的奋斗精神继续支持他们迈向新的成功。那阶段在国外学习的留学生，无不日以继夜，废寝忘食。这一段的艰苦日子一方面使他们在学术上跃登上了科学的最前沿，其中不少人脱颖而出，成为各门专业的领头学者；另一方面他们适应了在发达国家中的生存规则，改变了人生观。用他们新的学术观和人生观再来观察自己的祖国，就有了许多全新的看法。这是长期生活在国内的人很难看到的。这也是编辑这本书之所以有意义的原因。

作为经济学家，回到国内首先看到的是到处都有创造财富的机会可是没有加以利用，由于规章制度的刚性、积极性没有发挥出来。以后进一步发现计划经济的残余和所有权的模糊是许多问题的根子，因而有一段时间大家的注意力集中在改革计划制度和所有权上。最近一段时间更进而研究政治改革和经济发展的关系，提出宪政问题，区分好的市场经济和坏的市场经济，指出中国发展的前景可能落到裙带资本主义或叫腐败资本主义，它有别于发达的资本主义。本文集中的好几位学者都写过许多这方面的文章。他们比国内学者更有优势的是视野更宽阔，他们有居住在不同制度的国家中的经验，而且经常旅行到不同发展模式的国家，既包括东欧的转型国家，也包括南美、东南亚等误入歧途的民主国家。特别是他们有言论自由的保障，讨论问题可以直言不讳，没有顾虑，文章不会被修改，观点不会被扭曲。他们的这些论著通过各种渠道影响到了国内。引发了国内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关系的热烈讨论。

市场经济是一个好制度，经济学理论可以证明它既能保障个人自由，又能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世界上的发达国家没有一个不是市场经济制度的。可是也确有一些国家走上了歪路，表面上也是市场经济，而且又是民主政治，可是经济搞不上去，政治也不安定。而且一旦进入歧路，似乎很难再拐回来，这里面究竟问题何在，非常值得研究。在国外的这几位经济学家都对这个问题做出了巨大的努力，寻求答案。他们比较了不同国家的

道德、文化、法律、历史，甚至地理条件，更从近半个世纪所发生的政治事件，以事实做比较，试图归纳出主要的线索。这样的研究，因事实浩繁，理论也错综复杂，显然是非常困难的。近年来能够听到他们的发言，看到他们的文章，总起来看，进展是明显的，现在头绪已经逐渐地梳理出来。这两类国家的主要区别在于法治的是否完善。落后国家的问题必定和法治有关，或者国家领导人破坏法治，或者军队干预政治，或者民族之间，利益集团之间不依法办事，我行我素。且不说法律是否良好公正，就算有一个好的法律，如果有法不依，视法律如儿戏，就等于没有法律一样。一旦法律的严肃性被破坏，再也没有可供遵循的规则，混乱就在所难免，要重新建立规则，绝不是容易的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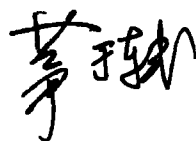
为什么法治被破坏？有两种原因。首先是国家有特权阶层，其次是百姓没有守法的习惯。先说特权对法治的破坏，这是显而易见的。我们经常听到、看到的司法不能独立执法，大多数就是因为有特权的领导下命令，写条子，打招呼造成的。法官不能按照自己的良心判案，正义被破坏，社会很容易陷入动乱。然而解决特权的问题并不容易。一般人总以为打倒特权之后，就是人人平等的社会。可是问题并不是那么简单。事实上任何一个有秩序、有组织的社会都有某种特权，比如政府官员就必须有特权，否则社会中谁跟谁都一样，由谁来执法？由谁来司法？没有权威，绝对平等的社会是无法治理的。所以办法不是打倒一切特权，而是对特权的限制和监督，也就是要有一个民主制度。建立民主制度的问题就极其复杂，它牵涉到全部立法司法的细节。即使在民主法治很完善的国家里，特权者试图置身于法律之外的事还是层出不穷。

再说百姓没有守法的习惯。举例讲，总统竞选时，两个竞选人各自拥有一大批群众，当竞选结果发表之后，失败方的群众能否服从公布的结果？在有法治传统的国家里，失败的一方虽然垂头丧气，但是不会对结果不买账，继续拥护已经失败的竞选人。而在缺乏法治传统的国家里，最经常看到的是失败的一方继续支持已经失败的竞选人，不服从选举的结果。选举等于作废，国家陷入混乱。印尼和菲律宾都发生过这样的事情。这是讲的选举。在法官判案时，败诉方也往往不买账，上诉是极普通的事。这些国家的人民中缺乏尊重对方，理解整体利益的思想方法，造成对法律的漠视，这不得不归为文化因素。

从以上两方面的因素来看，建立一个法治社会绝不是可以一蹴而就的事。拿中国的具体情况看，由于教育水平比较低，文化传统中缺少法治和平等观念，倒是人治和特权的观念比较普遍，所以要过渡到民主法治的社会，困难可能比较多。当今特别需要注意的是防止走回头路。政治上强调专政，

人事上吹吹捧捧搞个人崇拜，宣传上打击对自由平等的追求，曲解人权，都是走回头路的一些现象。我们要对此保持警惕。

这本书的出版一定能够在推进中国现代化的伟大事业中做出它自己的贡献。一本书的力量当然是有限的，但是许许多多的书就能汇合成巨大的力量。何况这是一本与众不同的书。我期待它的成功。

A handwritten signature in black ink, appearing to read '马彦涛' (Ma Yanchao), written in a cursive, expressive style.

2003年7月

目 录

序

茅于軾

1. 白重恩 / 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 香港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副教授 1

如果说经济学研究的是人的理性行为的话, 那么作为经济学家的白重恩看上去就不那么“理性”了。出于对经济学的兴趣, 在取得了数学博士学位以后, 白重恩继续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如果说对兴趣的追求是理性行为的话, 那么白重恩的选择又是十分理性的。

2. 陈志武 / 耶鲁大学金融经济学博士, 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系教授 19

两年前, 陈志武并不关心国内的事情。2001年7月, 因一个偶然的开始关注起国内的经济发展和金融市场的状况, 并把大量的精力投入到国内金融市场的研究上来。他的工作已经在国内产生了很大的反响, 用他自己的话说, 他又开始了人生的第二个职业。

3. 李稻葵 / 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香港科技大学经济系副教授 43

李稻葵之所以选择了经济学，选择了转轨经济学的研究，是因为他觉得他们那一代人在改革之初上大学，有一种参与经济改革的情结。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在1999年他回绝了美国一些大学的邀请而来到了香港科技大学任教。

4. 钱颖一 / 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伯克利加州大学经济系教授 63

在留学北美的经济学家中，钱颖一是研究比较制度经济学和转轨经济学的一个主要代表。这些年来，他在世界顶尖的经济学杂志上发表了多篇有关中国经济改革和转机的论文。正是在钱颖一等华人的努力下，中国的经济改革和转轨被越来越多的主流经济学家所关注和研究。

5. 陶志刚 / 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博士，香港大学商学院副教授 93

陶志刚认为做一些很高深的研究很有必要，但是做实际工作的人往往会遇到一些问题，能够在这些方面给这些人提供帮助，解决他们的问题，同时又能上升到理论高度，这是陶志刚的追求。

6. 田国强 / 明尼苏达大学经济学博士，德克萨斯州农工大学经济系教授 111

田国强的求学道路异常坎坷，每一次都是在几乎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出现转机，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田国强经过不懈的奋

斗，终于成为明尼苏达大学经济系30年来最好的学生之一。随后，获全美斯隆博士论文奖、改革开放后留学北美的华人经济学家第一个获得终身教职、第一个成为正教授，一系列的荣誉接踵而来。

7. 王江 / 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金融学博士，麻省理工学院斯隆商学院讲座教授

161

一个偶然的机，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就读物理学博士的王江对金融学产生了兴趣。因此他在获得物理学博士之后，转入沃顿商学院攻读金融学博士。正是这个偶然，产生了一位全球顶尖的华人金融学家。

8. 王一江 / 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明尼苏达大学卡尔森管理学院副教授

181

王一江觉得命运对他学业和事业的安排，似乎总是比他想像和期望的要好一点。看起来他要比别人顺利，但是在这表象的背后，是他不懈的努力。现在，作为《中国经济评论》的执行主编，他又在推动着中国经济研究走向国际主流经济学舞台。

9. 文贯中 / 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博士，三一学院经济系副教授

203

由于复杂的身世，文贯中从小就饱尝苦难，其中的经历常人难以想像。但是无论多么困难，他始终坚持不懈。正是由于他在农村插队的经历，文贯中对于中国农村的落后和农民的贫困有着深切的认识，因此多年来他的研究一直关注中

国的三农问题，文贯中认为中国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中国的城市化。

10. 谢丹阳 / 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博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高级经济学家

265

谢丹阳在新增长理论研究方面有所建树。1991年，还在读书的他就在《政治经济学》杂志上发表论文，在1998年又成为香港科技大学经济系第一个拿到终身教职的年轻教师。2000年到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之后，谢丹阳的研究重点就从经济增长以及国家政策跟经济增长的联系这些纯理论问题转向研究银行体制等更加现实的宏观经济问题。

11. 许成钢 / 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伦敦经济学院经济系副教授

281

许成钢是一个总在思考问题的人。在转轨经济学领域发表一系列有影响的论文之后，近年来许成钢开始研究法律问题，他的“不完备法律”理论代表了用经济学分析方法研究法律问题的一个重要方向。

12. 徐滇庆 / 匹兹堡大学经济学博士，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休伦学院经济系副教授

315

在取得终身教职之后，徐滇庆的主要精力就放到中国经济问题上来，他自称是中国改革的一名哨兵，把看到的国外先进的经验介绍进来，他的很多见解得到高层的重视。近年来徐滇

庆积极推动在中国组建民营银行的工作，被媒体称为“中国民营银行的总设计师”。

13. 杨小凯 / 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博士，莫纳什大学经济系讲座教授

337

在普林斯顿读书期间，杨小凯把自己的思想变成了漂亮的经济学模型，随后他因劳动分工的内生演进来解释经济增长的文章而一举成名。他创立的新兴古典经济学已经对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学形成了挑战。

14. 张春 / 西北大学经济学博士，明尼苏达大学卡尔森管理学院副教授

375

尽管是金融系的教授，但是张春强调自己是用经济学的方法研究金融问题。在研究金融学的同时，张春在劳动力经济学和中国经济的研究方面也很有建树。张春的研究对于理解中国当前如何解决这两大难题提供了很大的帮助。

15. 张欣 / 密歇根大学经济学博士，托列多大学经济系副教授

397

尽管大学读的是中文，但是张欣对于经济学的兴趣更大。在伯克利拿到东亚研究硕士学位之后，他又到密歇根大学学习经济学。张欣始终关注经济转轨和中国经济问题，他关于中国最佳通胀率的研究很有影响。

16. 朱晓冬 / 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博士，多伦多大学经济系副教授 417

朱晓冬总是把自己的成功归因于运气好，但是当我们了解到他为了自己的研究兴趣而放弃了在JP摩根很高的薪水到多伦多大学任教的时候，就能够感觉到他的成功绝不简简单单的是由于幸运。

后记

437

白重恩



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香港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副教授

如果说经济学研究的是人的理性行为的话，那么作为经济学家的白重恩看上去就不那么“理性”了。出于对经济学的兴趣，在取得了数学博士学位以后，白重恩继续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但是在他的经济学研究中，数学用的却不是很多，他的研究领域是要求对实际情况有充分了解的应用经济学，因为这是他的兴趣所在。如果说对兴趣的追求是理性行为的话，那么白重恩的选择又是十分理性的。

1 学术研究

白重恩的研究并不只局限于中国经济，更多的是经济学应用理论的研究，不是仅仅应用来解释中国经济现象，而是强调普遍的应用。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领域：组织经济学和转轨经济学。

美日的劳动力市场

白重恩最开始做的研究是比较美国和日本的劳动力市场。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时候，很多人都说日本要成为世界第一，搞得美国人很紧张。对于中国人来说，这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日本和美国的经济有很多不同的地方，如果日本那么成功，我们是不是要多学一点日本？那样，中国的改革就会从日本的经济发展中多汲取一些经验。因而，研究日本和美国经济的区别是很有意义的。日本和美国的经济有各方面的区别，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劳动力市场的差别：日本的工人很敬业，很能干，是多面手，互相协调、团队精神也很好，忠于企业；美国的工人可能有创造力，但是自由散漫，对企业不忠诚，跳槽的多，企业对工人也不忠诚，企业景况不好的时候就会解雇工人。两个国家的劳动力市场中，工人对企业的态度、企业对工人的态度都很不同。白重恩和王一江注意到这方面的不同，当时合作做了这方面的研究，这成为白重恩毕业论文的一部分。他的毕业论文运用劳动合同的模型，比较美国和日本劳动力市场以及比较不同行业的劳动力市场。但由于很快在90年代初日本经济就垮下来，美国学界对日本经济的兴趣迅速降温，这对白重恩造成很大的困扰。在毕业后的头几年他没有发表什么文章。他的论文转了多个杂志也没能发表，后来他们只好把应用的部分去掉，理论部分发表在《劳动经济学》（Journal of Labor Economics）杂志上。

软预算约束

白重恩后来研究关于软预算约束的问题。软预算约束这个概念来自科尔奈（Kornai）1980年的经典著作《短缺经济学》，用以解释社会主

义经济中效率低下的一个重要原因。科尔奈描述了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下普遍的“父爱主义”，政府像家长似的，企业就是孩子，孩子生出来，家长就要保证孩子存活下去。所以企业经营不善的时候，政府总是会不断地给企业补血，不会让企业垮掉。长期亏损的企业由于总是受到财政补贴和其他形式的救助，而不能被市场竞争所淘汰。在白重恩看来，科尔奈的解释肯定有他有道理的一部分，他也相信这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但是他认为这可能不是全部的因素，可能还有其他的一些因素。马斯金（Eric Maskin）和他的几个学生德瓦特里庞（Mathias Dewatripont）、钱颖一、许成钢等都对软预算约束问题很感兴趣，马斯金和德瓦特里庞1995年发表在《经济研究评论》（Review of Economics Studies）上的那篇《集权和分权经济中的信贷和效率》（*Credit and Efficiency in Centralized and Decentralized Economies*）文章提出的DM模型是软预算约束的第一个正式模型。该论文解释了为了弥补过去投资而再投资的动机，描述了项目融资事前和事后的差别。比如说一个项目前面已经投资了两块钱，需要再投资两块钱才能生出三块钱，在作第二期投资决策的时候，因为前面投的两块钱已经沉淀了，银行和投资人从自身经济利益出发，还是要追加投资，因为再投两块钱就能得到三块钱，所以追加投资在此时看来不是一个坏决策。可是，从事前的角度来看，这是一个坏项目，因为总共投四块钱才能生出三块钱，会亏本。如果项目经理只在乎项目能否完成，而不在于它是否有利可图，就会想方设法来得到第一期投资，一旦第一期投下去，他会再找投资者说：哎呀，运气不好，市场突然变得恶劣了，我们还要追加投资两块钱才能得到三块钱，他知道投资者会投第二期，所谓的钓鱼工程就是如此。这就是DM模型的基本故事。模型是严谨的，由此再做一些延伸以后就可以解释很多现象，比如说马斯金和德瓦特里庞用这个模型来解释集权和分权的不同意义。

白重恩和王一江提出的问题是：并不是所有的项目都是两块钱加两块钱生三块钱的情形。有的时候是投了两块钱以后，还要再投两块钱才能得到一块钱，政府或者银行还会投。这样的事情为什么会发生？为什么有的时候明知这个项目是要亏损的，但是还要继续投资？1996年，白重恩和王一江的文章是DM模型之后对软预算约束研究的深入。在森严的多层官僚体制下，领导会为了自己的声誉而挽救处于危机的组织。在具体到投资项目中，谁来批准项目的投资？是做计划的人，即并不是投资的人（国家），而是投资人的代理人（官僚），这些代理人有自己的利益。比如说作为一个地方的机关，批准了一个项目。这个项目第一期的投资比如说花了两块钱，突然有一天这个地方机关发现这个项目是一个